

上海财经大学翻译硕士学位论文

历史文本翻译中的重写策略——以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汉译为个案

学校代码：10272

院系：外国语学院

学号：2024214265

专业：英语笔译

姓名：赵乐阳

指导教师：郭鸿杰

2025 年 12 月

The Rewriting Strategies of Historical Tex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y

Zhao Leya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Guo Hongjie

December 2025

致谢

目录

致谢.....	III
摘要.....	VI
Abstract.....	VII
1. 引言.....	1
1.1 项目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1
1.3 论文框架.....	2
2. 翻译过程.....	2
2.1 译前阶段.....	2
2.2 译中阶段.....	2
2.3 译后阶段.....	4
3. 文献综述.....	4
3.1 重写理论.....	4
3.2 叙事理论.....	5
4. 译例分析.....	6
4.1 词汇层面的重写.....	7
4.1.1 作为命名的词汇.....	7
4.1.2 作为标签的词汇.....	8
4.1.3 作为语气的词汇.....	10
4.2 句法层面的重写.....	11
4.2.1 参与者显化.....	12
4.2.2 过程类型转化.....	14
4.2.3 句式重组.....	15
4.3 叙事层面的重写.....	18

4.3.1 重写战争合理性.....	18
4.3.2 重写责任归属.....	20
5. 结语.....	23
参考文献.....	25
附录.....	26

历史文本翻译中的重写策略——以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汉译 译为个案

摘要：本翻译实践报告以迈克尔·A·巴恩哈特（Michael A. Barnhart）的学术专著《孤注一掷：饮鸩止渴的经济安全》（*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为对象文本。该书深入剖析了二战期间日本为寻求所谓“经济安全”而陷入总体战泥潭，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逻辑。鉴于原文本涉及敏感的历史题材，且存在源语（英语）对日语术语的转译现象，本次翻译任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操作难度。

本报告主要由翻译过程回顾与译例分析两部分组成。在翻译流程上，本项目创新性地采用了“大语言模型（LLMs）+人工介入”的深度协作模式。通过引入 DeepSeek-V3 模型与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有效解决了长文本理解、术语提取及日文人名与专有名词的回溯校验问题，克服了二次转译带来的信息磨损与失真。

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报告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重写理论为总体框架，并融合莫娜·贝克（Mona Baker）的叙事理论，探讨了译者如何在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的制约下对历史文本进行负责任的重写。报告从微观到宏观划分了三个操控层面：在词汇层面，通过对“南进”等术语的再命名及语气调节，校准历史评价；在句法层面，利用参与者显化与过程类型转化，突显施事者的主体责任；在叙事层面，通过因果情节配置与书名再框定，消解了原文隐含的战争“必然性”逻辑，重构了符合历史正义的责任归属链条。

本研究表明，历史文本翻译不仅是语言信息的转换，更是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的再建构。译者需在保持史实准确性的基础上，通过自觉的叙事干预，规避为侵略者逻辑背书的风险，从而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有效对话。

关键词：重写理论；叙事理论；历史文本翻译；大语言模型

The Rewriting Strategies of Historical Tex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Abstract: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academic monograph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by Michael A. Barnhart. The book provid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aradox wherein Japan, driven by the ideology of "total war"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security," plunged into a quagmire of aggression and self-destr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Given the sensitive historical subject matter and the linguistic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ivot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terms via English, this project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complexity.

The report consists of a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s. In terms of workflow, this project innovatively adopts a "Human-AI collaboration" model. By integrat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such as DeepSeek-V3 and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 technology, the translator effectively addressed challenges related to long-text comprehension, terminology extraction,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Japanese personal names and proper nouns, thereby mitigating information loss and distortion caused by the indirect translation path (Japanese-English-Chinese).

Theoretically, the report draws upon André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as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complemented by Mona Baker's Narrative Theory, to explore how translators conduct responsible rewriting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across three levels of manipulation: at the lexical level, historical evaluations are calibrated through the renaming of terms like "Southward Advance" and tone adjustment; at the syntactic level, the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of actors are highlighted through participant explicitization and process type conversion; at the narrative level, the implied logic of war "inevitability" in the source text is deconstructed, and the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is reconstructed through causal emplotment and the reframing of the book titl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is not merely a transfer of linguistic information but a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Translators must exercise conscious narrative intervention while maintaining historical accuracy to avoid validating the logic of aggressors, thus achieving effective dialogue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Keywords: Rewriting Theory; Narrative Theory; Historical Text Translati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1. 引言

1.1 项目背景

本翻译项目的对象文本是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A·巴恩哈特（Michael A. Barnhart）于1987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孤注一掷：饮鸩止渴的经济安全》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其深刻揭示了1919年一战结束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本为求“经济安全”却走向自我毁灭的悖论。全书指出，受“总体战”思想驱使，日本试图通过对外扩张掠夺重要战略资源，实现本国的资源自给（autarky），从而为未来与假想敌（美国或苏联）进行战略决战打下基础，但1937年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反而将其拖入消耗泥潭，急剧增加了对美国资源的依赖，且过早暴露了其狼子野心，导致日美关系不断恶化。最终，面对美国的贸易禁运，陷入绝境的日本为夺取石油不得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陷入了“为确保经济安全而发动的战争，最终却摧毁了经济安全”的怪圈，实为历史的一大讽刺。

本项目的译介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补充与跨文化实践两个维度。在学术层面，本书引入了“他者”视域下对二战日本战争经济逻辑的深度解析，是对国内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在实践层面，这也是一次深度的跨文化对话。面对源文本“客观中立”的学术话语与目的语读者“受害者记忆”之间的情感张力，译者通过自觉的叙事重构策略，在忠实传达原作者关于日本“总体战”体制溃败之深刻洞见的同时，有效消解了原文在叙事上可能存在的对受害者的无意识偏见，并且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影响下有意重写部分内容，使其契合国内主流的历史叙事逻辑，从而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因此，本项目不仅提供了珍贵的史学研究参考，更为探索在意识形态差异下如何进行负责任的历史文本翻译提供了现实参照。

1.2 研究意义

本翻译实践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适用性的拓展，以及对国内相关历史研究的译介补充两个层面。

第一，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拓展了重写理论与叙事理论在非文学文本中的解释边界。本研究突破了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通常囿于文学翻译分析的局限，将其引入军事历史文本这一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敏感性的场域。通过将译者的有意识操控置于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交互场中考察，并结合莫娜·贝克的叙事理论进行对历史叙事的有意识重写，本研究以文本证据验证了重写理论与叙事理论在处理意识形态敏感文本时的强大解释力。

第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实现了学术视角的补充与翻译理论的落地。本项目译介的《孤注一掷》以“经济安全”为视角剖析日本战时体制，为中文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来自“他者”的补充。更关键的是，面对源文本“客观中立”叙事与目的语读者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张力，本研究探索了如何通过自觉的叙事调适，在保持学术论证严谨性的同时，避免对侵略行为产生弱化或正当化的联想，从而为跨意识形态语境下负责任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具体参照。

1.3 论文框架

本报告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言，介绍本次翻译项目发生的背景与翻译材料；第二部分翻译过程，总结核心翻译过程，即译前通过大语言模型（LLMs）对全文内容进行大致把握，译中在使用大语言模型初译后逐一深入检查并修改，即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模式，以及译后进行审校；第三部分文献综述，概述了重写理论在国内外的的发展，探讨本次翻译实践如何在其框架中影响具体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的选择；第四部分案例分析，主要基于 Lefevere 的重写理论与 Baker 的叙事理论，探讨《孤注一掷》中的若干具体译例，总结了相关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五部分结语，总结本次翻译实践的主要体悟与发现，挖掘反思与不足，为未来相关翻译实践与研究提供建议。

2. 翻译过程

当前，大语言模型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已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生产力，其带来的技术革新构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本次翻译实践并未局限于传统的作业方式，而是将大语言模型充分融入并重构了翻译的全流程。

在具体执行中，我们将大模型作为核心辅助力量，全方位嵌入译前、译中及译后的全生命周期：译前利用大模型进行术语提取与背景知识图谱的构建；译中通过大模型生成初译，并引入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提升初译质量；译后结合大模型进行语言校对与润色等。这种“AI+人工”的深度融合，旨在利用技术优势突破传统人工翻译的效率瓶颈，从而为产出高准确度、高可读性的译文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1 译前阶段

理解是翻译的前提，而准确、深刻、全面的理解是高质量翻译的基石。鉴于此，本次翻译实践在正式动笔之前，利用 DeepSeek-V3 模型实现了预理解与深度理解的结合。

首先，借助 DeepSeek-V3 卓越的长文本处理能力，对全书内容进行宏观摘要与逻辑梳理。这一步骤不仅帮助译者迅速把握全书的主旨大意、叙事脉络及核心论点，更在脑海中建立起完整的认知框架，从而对主题有一个预先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回归原文进行深入研读。这一过程依托大模型提供的全局视野，进一步剖析复杂的句法结构与深层意蕴，同时在理解碰到障碍或遇到知识盲区时利用 AI 辅助，避免产生偏差。这种宏观指引与微观钻研互补的理解模式，有效扫清了潜在的认知盲区，为后续产出准确且流畅的译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译中阶段

尽管大语言模型已能胜任绝大多数翻译任务，但仍面临两大瓶颈：

其一，在不使用检索增强生成（RAG）的情况下，仅依赖模型在预训练阶段习得的静态知识，难以精准应对特定垂直领域的专业问题。具体到本书，这

一问题表现为：部分日语术语、人名等在经由英语转译（日译英）后发生了信息磨损或语义偏移；当模型再将其从英文译为中文时，由于缺乏对原始日本历史语境的直接回溯能力，极易导致生成的译文与史学界通用的、基于日语直译的标准结果产生显著差异，甚至出现类似“常凯申”（误译蒋介石）式的错误。

请看下面一例：

【原文】The cabinet-level discussions of the summer of 1936 did little to address Ishiwara's concern. Their resul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Policy,” was a vague set of directives promising all things to all parties... A separate interministerial decision, “Second Policy for North China,” listed the resources targeted for specific attention—iron ore, coking coal, and industrial salt among them—and noted promising sites.

【译文（AI 初译）】1936 年夏天的内阁级别会议，并没有多少讨论是解决石原莞尔的忧虑的。他们的讨论结果《国策基准》是一套模棱两可的准则，承诺各党派其想要的一切……另一项单独的内阁决议《对华第二次处理纲要》列出了需要特别注意的资源，包括铁矿、炼焦煤和工业用盐，并提及了有开发潜力的地点。

【译文（人工修改后）】1936 年夏天的内阁级别会议并没有打消石原莞尔的多少焦虑。会议的结果《国策基准》是一套模棱两可的准则，看似承诺予以各党派想要的一切……另一项单独的内阁决议《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列出了需要特别注意的资源，包括铁矿、炼焦煤和工业用盐，并提及了有开发潜力的地点。

这段译文涉及两份重要的历史文件：《国策基准》（日语：国策ノ基準）是日本确立“南北并进”、明确指向大陆与海洋同步扩张的纲领性文件，直接构成了全面侵华与太平洋战争的官方指导方针；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日语：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綱）则标志着日本将策动“华北自治”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侵华野心的进一步实质性扩展。在此处，大模型虽准确识别了《国策基准》，但却将后者误译为“对华第二次处理纲要”，这一表述并非史学界的通用定名，需要人工介入修改。同类问题在日文人名的回译中表现得更为普遍：由于经历了“日语（汉字）——英语（罗马音拼写）——中文（音译）”的二次转译路径，其结果极易与基于日语汉字直译的标准译名背道而驰。因此，译者必须借助官职、身份等旁证信息回溯至日语源文本，锁定准确人名后再匹配汉语中的通用译法。

其二，受限于大语言模型的上下文窗口（Context Window）长度，一旦文本超出处理上限，蕴含在前文的关键信息极易发生丢失或“遗忘”，进而导致后续翻译出现错误，或难以保持术语与文风的前后一致性。对此，本项目采取了双重策略：首先是构建术语库管理机制，在本次翻译实践所运用的翻译项目管理系统中，该机制能捕捉并锁定核心术语，确保在遇到相同或相近表达时自动匹配统一译法，从源头上规避术语不一致的问题；其次是引入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该技术基于向量空间模型，将文本映射为高维向量，利用向量夹角越小、语义越相似的数学原理，系统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实时检索并“召

回”那些虽然在物理篇幅上距离较远（甚至超出窗口限制），但在语义概念上高度相关的“上下文”（context）。这使得模型在生成译文时，能够参考全局性的语义信息，从而有效防止因信息碎片化导致的误译或不一致现象。

2.3 译后阶段

译后环节是保障译文质量的收尾工作。为了确保译文通顺且地道，本次实践采取了技术校对与人工试读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利用大语言模型对全稿进行快速扫描与纠错。AI 在识别拼写错误、标点误用及明显的语法漏洞上效率极高，能有效修正因人工疏忽导致的低级失误，夯实语言基础。另一方面，为了跳出译者自身的视角局限，特别邀请了身边的亲友在不参照原文的情况下阅读译文。这种第三方视角的反馈能直观模拟真实读者的阅读体验，帮助发现那些虽然语法正确、但读起来拗口或带有明显翻译腔的表达。通过机器的自动化检查与真人读者的自然语感互补，最终确保了译文逻辑连贯，且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3. 文献综述

3.1 重写理论

在“重写”理论的谱系上，Lefevere 的贡献通常被置于 20 世纪后半叶翻译研究从“语言等值”转向“文化与制度条件”的整体潮流之中：一方面，俄国形式主义与后来系统论文学观为“文本在文学系统中被选择与传播”的视角提供了思想底色；另一方面，多元系统论与描述翻译学强调译入语规范、文学系统与社会机制对译文的塑形作用，使翻译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受制于文化结构的生产活动。操控学派对这一趋势作了集结式推进，明确把翻译与改编、评论、选本等并置为影响文学声誉与经典形成的“操控”实践（Hermans, 1985）。在此语境中，Lefevere 以“折射”或“重写”的概念切入，强调文学作品进入另一种文化并非“透明传递”，而是经由重写者的筛选与重组而被重新定位，其早期讨论已将“文本——系统——折射”作为解释框架来说明重写如何改变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与形象（Lefevere, 1982）。到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Lefevere 进一步把“重写”系统化为可操作的解释模型：翻译只是重写的一种形态，重写活动背后存在相对稳定的约束变量，其中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机制共同决定何种文本被译、如何被译、以何种方式进入流通与经典化过程（Lefevere, 1992）。这一理论化路径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译文差异从语言层面的偏离解释，转向对文化生产机制的因果追问，从而为后来的“文化转向”研究与出版史、文学社会学取向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接口。

围绕 Lefevere 的国外研究，后续深化大体沿着三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展开。其一是“经典与声誉生产”的路径：研究者以译本、序跋、评论与选集编纂为材料，考察重写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重组作家形象、建构文学史叙述并参与文化资本的分配，重点不在微观对等而在“何者成为可见的文学”。其二是“制度与中介机制”的路径：在赞助人概念启发下，研究进一步外延至出版机构、审

查机制、奖项体系与媒体话语等中介环节，把译者放回文化产业链与知识生产链中加以解释。其三是“意识形态与语篇操作”的路径：在批评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研究兴起后，学界更关注重写如何通过词汇、修辞与文本结构选择实现立场建构，并与当代意识形态翻译研究形成对话。例如 Munday 从文本风格与意识形态动因关系切入，对“文本选择——表达方式——价值指向”的关联作了更细的阐释（Munday, 2007）。总体而言，国外研究的推进呈现出从“宏观机制提出”到多材料、多场域的经验验证的走向，即不断把 Lefevere 的三要素模型放到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与传播链条中检验其解释力。

相较之下，国内关于 Lefevere 的“重写”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清晰的“译介——阐释——应用——反思”演进轨迹。早期研究多以理论引介与概念辨析为主，强调重写理论对传统等值观的突破，并将其与操控学派、文化转向相关论述并置说明。随后研究热点转向案例应用，常见材料包括文学经典的多译本比较、意识形态强相关文本（政治、历史叙述）的译介，以及影视字幕、外宣文本等更贴近当代传播场景的重写现象。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针对关键术语与理论边界的校勘式讨论，例如邱进、胡文华与杜凤刚就 *rewriting* 应译为“重写”还是“重写”展开辨析，并指出国内接受中存在将概念泛化、将其简单等同于“随意改动”的误读风险，这类工作对规范理论使用具有基础性意义（邱进等, 2014）。总体来看，国内研究的优势在于结合中文语境与具体译例，易于呈现“意识形态——诗学规范——传播中介”对翻译决策的共同制约；不足则常表现为两点：其一，赞助与制度维度在实证材料上展开不够，研究容易停留在意识形态解释，而缺少对出版链条、委托机制与读者市场的证据支撑；其二，理论术语有时被作为“宏观标签”使用，与文本层面的可检验指标衔接不紧，导致解释更多依赖研究者直觉而非可复核材料。

3.2 叙事理论

以 Baker 为代表的翻译叙事研究，其思想雏形来自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即叙事不再只是文学体裁或语言形式，而被理解为人们组织经验、建构身份并协调行动的基本方式。Fisher 提出“叙事范式”，将叙事视为公共道德论证与意义沟通的核心机制（Fisher, 1984）；Bruner 进一步从认知与文化心理学角度论证叙事在“现实”建构中的基础地位（Bruner, 1991）；Somers 则在历史社会学中强调叙事与身份、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为“叙事作为社会解释工具”提供了范畴与方法论资源（Somers, 1992）。与此同时，传播学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框架”理论（*framing*）为叙事如何通过选择、显著化与因果连接来塑造公共理解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语言（Entman, 1993）。Baker 的重要贡献，是把上述社会叙事理论与框架研究引入翻译研究，使翻译不再仅被理解为意义转移，而被理解为对既有叙事的“再叙事”与再定位过程。她在 2005 年的论文中率先明确提出以社会叙事作为翻译研究的解释资源，批评将翻译想象为天然促成理解与和解的行业叙事，并强调翻译同样可能参与冲突叙事的生产与扩散（Baker, 2005）。在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中，Baker 以“翻译嵌入冲突”的问题意识系统阐释叙事类型、叙事特征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提出可据以分析译者如何通过情节组织、因果连接与角色定位来重塑事件意义（Baker, 2006）。其后，她在研究“反恐战争”等政治冲突语境时进一步以“框架化”作为核心机制，展示译者与机构如何通过选择性挪用、标示、时

空定位与参与者再定位等方式重构冲突叙事，从而把叙事研究推进到更具方法论可复制性的层面（Baker, 2007）。围绕“再叙事”的伦理维度，她又通过访谈与反思提出译者责任与立场问题，使叙事研究与翻译伦理、翻译行动主义形成更紧密的议题耦合（Baker, 2008）。在更具体的冲突场域中，她还把注意力投向战争地带的口译员与译者被如何“讲述”与自我讲述，强调叙事位置与权力关系对翻译主体性的塑形（Baker, 2010）。

基于 Baker 的开创性工作，国外叙事取向研究逐渐形成较稳定的研究版图：其一，聚焦国际新闻、政治传播与军事冲突语境中的翻译如何参与公共叙事竞争，常结合框架理论与语料分析；其二，聚焦翻译行动主义与社会运动网络中的叙事实践，既研究文本，也研究跨语社群如何通过翻译建构共同体叙事与动员话语；其三，方法论上出现从纯文本对照走向民族志、口述史与网络传播研究的趋势，强调把译者、机构与媒介平台作为叙事生产场域来观察

（Harding, 2012; Sadler, 2023）。这意味着 Baker 路径的不断深入发展表现为研究对象从书面文本扩展到行动网络，从语言层面扩展到媒介与组织实践，从而使叙事理论真正成为可跨材料使用的解释框架。

国内对 Baker 叙事理论的引介与应用同样呈现从理论阐释到多领域实践的扩展。黄婷与黄勤的文章属于较早对其理论框架进行系统介绍并讨论应用空间的研究之一，强调 Baker 以社会叙事与“建构/框架化”解释翻译活动的创新性，同时指出其理论在具体操作中对材料与语境信息的依赖较强（黄婷 & 黄勤, 2016）。夏天（2025）以元史学、叙事学和翻译学为基础，分析了英国汉学家道格思在译介《成吉思汗》时如何通过海登·怀特所谓美学、认识论和道德三重维度的重写重构历史叙事并使其克服中西方叙事传统差异、贴合读者期待。除大陆研究外，赵志敏与陈昕从“引介——回顾——展望”的角度梳理 Baker 叙事翻译观在中文文学界的传播与研究议题分化，为国内研究路径的自我描述提供了更直接的“学术史”材料（赵志敏 & 陈昕, 2014）。在应用层面，国内研究常以政治语篇、外宣文本与新闻翻译为对象，强调译者通过叙事建构策略实现立场呈现与受众导向，例如以政府报告等政治文本英译为材料讨论叙事建构机制（覃玉荣等, 2018）。总体而言，国内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把 Baker 提出的叙事类型与框架策略转化为中文语境下可识别的分析维度，并在政治传播与外宣翻译等领域形成较丰富的案例积累；但其常见短板也较明确：一是研究容易停留在“译文对比——策略归类”的层面，对叙事生成的制度条件、传播链条与受众接受缺少足够材料；二是“叙事”概念在使用中有时被泛化为“主题/立场”，从而削弱其作为解释框架的独特性。

4. 译例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成果，本文在宏观上以重写理论为总体框架，在微观操作层面则将译者的干预划分为词汇、句法和叙事三种互相关联的操控：词汇层面聚焦评价性用语与关键历史名词的选择、显隐及语义重塑，句法层面考察句式重组、主客体转换与信息重心的调整，叙事层面则关注事件排序、因果逻辑与责任归因的重构。下文将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叙事片段为例，依次展

开这三层操控的具体分析，以呈现译者如何在中西叙事资源之间，通过重写实践建构符合当下语境的战争记忆话语。

4.1 词汇层面的重写

词是最小的造句单位，也是能够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最小语言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小，其所承载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对词汇的重写亦能对文本产生显著影响，从而服务于译者的整体翻译目的。本节聚焦词汇层面的重写，旨在呈现译者如何在不改变基础事实的前提下，通过翻译过程中对词语的选择性重写，调节原著的历史叙事立场与可接受性。原文作为一部历史专著，使用了较多偏学术、技术性的政策术语与评价性表达：前者往往以中性命名使扩张行为“隐形”，后者则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改变事件参与者的立场定位，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认知。Allawzi 等

（2022）指出，译者可借助替换、增加与省略词汇等方式，对事件和参与者进行再框定，从而在总体信息不被实质重写的情况下重组叙事导向。据此，本节将从命名、标签与语气三个维度展开：在命名维度，重点讨论 Southward Advance 等称谓如何遮蔽受害者，并通过重新命名实现侵略性质的前景化；在标签维度，考察评价词的极性与强度如何被强化、弱化或中性化，以体现译者的价值定位（Gao & Munday, 2023）；在语气维度，则追踪程度副词、情态词等对叙述口吻的影响，说明译者如何通过语气调节拉近或拉开与话语主体的距离，由此凸显词汇选择作为话语干预的第一道关口，如何为后续的结构调整与叙事重构提供方向与边界（Wang & Munday, 2020）。

4.1.1 作为命名的词汇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文本操作活动，而是受到意识形态、社会规范、文化传统等的操纵和约束（Lefevere, 2004: 13）。因此，译者必然要选择顺应目的语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关键概念、行动及其参与者进行词汇层面的“命名”，有针对性地重写语言措辞，从而转变词汇中折射出的立场预设与叙事定位。在 Baker 的叙事理论中，这种做法被称为“标签建构”，即通过为群体、人物或事件选择特定称谓来实现定性与导向，从而把宏观叙事诉求落实到具体词汇上。基于此，本节将重点关注源语中看似中性、技术化的政策和行动称谓如何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性质进行话语包装，以及译者如何在目的语的历史叙事与读者预期之下，通过重新命名调整其立场，使译文更容易被本土语境所接受。

请看下面一例：

例 1

【原文】The second was that Japan began the Southward Advance to achieve autarky knowing that the price was war agains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译文】第二个讽刺之处在于，日本明知代价将是与英、美开战，却仍要向东南亚扩张侵略，即所谓“南进”，以谋求战略上的自给自足。

【分析】Southward Advance 通常被译为“南进”，是二战时期日本国内两

大战略学说之一，主要由海军推动，主张日本应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扩张影响力，获取其石油、橡胶、锡等战略资源，从而实现战略上的自给自足，并具备与假想敌决战的能力。该政策与陆军主导的北进论（Hokushin-ron，向苏联、中国大陆和蒙古方向扩张）相对立。

Shehab 和 Hamamra（2025）指出，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各种历史叙事、身份认同与政治合法性进行博弈的场域。Southward Advance 看似是对日本战略方向的无害表述，实为战时其政治军事语汇对侵略扩张实质的“命名包装”：用 advance 这类过程名词把“侵略”和掠夺资源的行为后果弱化为过程性的、中立的“推进”，并从中隐去了受害者。考虑到该政策在国内的认知度相对“奉天事变”（九一八事变）和“中国事变”（卢沟桥事变）而言较低，译文若仅包括“南进”一词，首先会产生地理方向问题：英美不在日本的南方，何谈“南进”？这就容易产生误解；同时受害者（东南亚地区）在目标语中也不会得到声明。译文一是用“所谓”破除了语言表面的无害特质，二是在同位语解释中补充“向东南亚扩张侵略”，不仅澄清了方向问题，也揭示了其本质，从而在词汇命名层面把行动的对象与受害者重新推到前景：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对谁做了什么”，其次才是日本以 autarky（自给自足）为名的自我叙述。

4.1.2 作为标签的词汇

词汇不仅是指称对象的命名手段，更是叙事建构中最直观、最具即时效果的“标签”：同一人物、群体或事件一旦被置入某一称谓体系（如带有褒贬倾向的词汇），其价值取向与道德定位往往就被预设并自然化，从而在读者的理解路径上形成先验的解读框架。以叙事理论的视角看，翻译可以通过“标签化”实现对叙事元素的再框定，即借助词汇层面的重写重命名关键角色与行为，使其更契合目标语语境中的主导叙事与可接受性预期（Mo, 2025; Shehab & Hamamra, 2025）。其中，词汇的评价意义通常由带极性的词汇选择直接实现，并可通过强度调节被强化、弱化或中性化，因此译者在跨语境转述历史与政治叙事时，往往会通过词汇替换、语义变化等方式重置标签的“评价负载”，在尽量维持事实信息的同时，降低目标读者的抵触感，或将原文立场导向重新嵌入本土话语的解释框架之中（Gao & Munday, 2023; Allawzi et al., 2022）。

下面将分别挑选以中日双方为被评价主体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译文中对特定词汇的处理如何体现了适应性的重写。

例 2

【原文】June brought new information confirming China's stridency. Colonel Nagatsu Sahishige, chief of the China Section of the General Staff's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turned to Tokyo on 8 June to report that the Kuomintang's New Life Movement was evolving; it was becoming a means to mobilize China totally as a militaristic state ready for action.

【译文】六月的情报进一步证明了南京的强硬立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Nagatsu Sahishige）上校于 6 月 8 日返回东京后报告

称，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正愈演愈烈；依其观察，这场运动正被用作推动全国性的社会动员，使中国具备更完善的备战能力。

【分析】本例选自第四章，说明在“卢沟桥事变”前的1937年6月，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在华北愈发可能发动全面战争的强硬立场与应对措施。原文 a militaristic state ready for action 的表述十分显眼，militaristic 意为“军国主义的”，如果机械直译，将中国军队描述为“穷兵黩武”，显然是不合理且无法接受的。Lefevere 指出，无论是制作翻译、文学史还是其他衍生作品，重写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造原作，使之适应主导或至少是某一主导的意识形态与诗学潮流”，而“重写具有操控性，且行之有效” (Lefevere 2017: 6)。在当代中国的抗战史叙事中，“军国主义”通常用于形容日本的政治体制，将中国称为“军国主义国家”不仅与叙事中的自我形象相冲突，也超出了国内出版界可接受的范围。因此，翻译时不可能在这一处进行简单的对等处理，而必须在忠实原意与顺应目标语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平衡。通过在译文中添加“依其观察”来说明这一段的内容是基于日方视角而非中方视角的，并将 militaristic 这一抽象词汇所表达的含义具体化，一是点明其实际效果是“使中国具备更完善的备战能力”，二是增加“全国性的社会动员”表明“新生活运动”原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而非“穷兵黩武”，译文不仅保留了原文关于“新生活运动”促成国内全面动员与备战的事实信息，同时避免在译文中体现认同日本军方对中国的贬抑性标签和评价，是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重写过程的显著案例。

例 3

【原文】At first, these concerns were muted, for the 1920s were the decade of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aishō Democracy’ in Japan. Still, men dedicated to achieving economic security for their country were not idle.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a program combining expansion abroad and reform at home which would accomplish their objective.

【译文】起初，这些担忧并未显露出来，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裁军、国际合作以及“大正民主”的时代氛围之中。即便如此，围绕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构想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政策层面持续酝酿，并逐步铺陈出一套对外扩展与对内改革相结合的方案框架，其目标在于实现所谓的经济安全。

【分析】从重写理论看，这里对 be dedicated to 的处理，本质上是在“意识形态”约束下对原文评价色彩与角色形象的再配置：Lefevere 在讨论赞助机制 (patronage) 时明确指出，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会“对形式与题材的选择及发展构成约束”，且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一切“由形式、惯例和信念构成的、规范我们行动的格栅 (grillwork)” (Lefevere 2017: 13)。在本例中，原文 men dedicated to 用 dedicated 一词为行动者赋予了明显的褒义伦理姿态，仿佛这些军官是“为国家经济安全尽职尽责的能人”，若直译为“致力于”或是“献身于”，会在叙事层面“正当化”或“合理化”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仿佛国家是不得已而为之，军官是一心为国的可敬之人。译文重写为“围绕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构想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政策层面持续酝酿”，采取了“去人格化”

“去褒义化”的词汇操控：一是刻意隐去了主语，防止译文被误读为是对“总体战”派军官的某种赞赏；二是把 *dedicated* 和 *for their country* 等词的主体性与价值判断，替换为“构想”“酝酿”等制度化、客观化的词项，句子的重点从“人”到作为“过程”的政策演进，使读者感知从“有担当的行动者”转为“政策议程的延续与推进”，从而弱化对行动者的道德认同空间，转向强调“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目标的持续性，并更贴合目标语语境中对该历史进程的主导解释。

4.1.3 作为语气的词汇

词汇的选择绝非仅仅是为了传递语义信息，它更是一种隐性的态度表达工具。除了基本的定义与评价功能外，词汇本身承载的语气强弱，往往决定了文本的情感色彩与叙事张力。在翻译过程中，语气的调节是译者介入文本的重要途径。面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译者既可以通过选用语气更强烈的词汇来凸显批判意识，强化读者的道德感知；也可以通过使用中性甚至模糊的词汇来弱化冲突，营造某种看似客观的效果。这种对语气维度的精细操控，看似只是微观层面的用词差异，实则在潜移默化中重构了原文的叙事立场，直接引导着目标语读者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与情感判断，从而实现了译者对文本深层意义的重写。

例 4

【原文】The Southward Advance, as Major General Tanaka Shin'ichi, chief of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averred in a formal conference on 16 January to set long-range army policy, would take place against minimal opposition. Only five months would be required to complete it.

【译文】按照作战部（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少将 1 月 16 日在一次旨在制定陆军长期方针的正式会议上的说法，“南进”预计几乎不会遇到像样的抵抗，仅需五个月即可一举完成目标。

【分析】Lefevere 强调译者在必要时会动用“言外行为策略（*illocutionary strategies*）”来调配文本对读者的最终效果，而这些策略并不限于语言层面的技术操作，更会在意识形态、诗学等层面运作，以“在另一个文化中投射作者的形象”。（Lefevere 2017: 7; 75）。在此意义上，*minimal opposition* 若直译为“最小程度的抵抗”不仅过于“中式英语”，不符合中文的诗学规范，也把“抵抗”变成了可量化之物，削弱了其反侵略性质；而译文用“几乎不会遇到像样的抵抗”对“抵抗”的效果构成双重削弱，凸显行动者对“南进”可能遭遇抵抗的轻视，突出其攻击性与狂妄，这是通过增强行动者的语气来强化对其的贬义评价效果。紧跟着的 *only five months...* 一句，*only* 本就有增强叙事口吻的效果，译文处理为“仅需五个月即可一举完成目标”，不仅把原句的增强对象“时间短”转化为“难度低”，更显日军之“乐观”，而且“即可”“一举”等增译之词也均更显日军认为“南进”成功的必然性。因此，本例是有意识地将日本军方

的乐观判断重写为更显轻敌与侵略心态的表述，使译文更稳定地落入目的语历史文化语境的“侵略——反侵略”叙事框架。

与此相对地，以下是弱化语气一例：

例 5

【原文】Nagano swore that Japan should never fight a war that could be avoided, but he warned against a peace that bought a little time at the price of eventual doom—a peace of the sort of the ‘Winter Battle at Osaka Castle.’ Sugiyama concurred. He explained the necessity of readiness to begin hostilities by the end of October and, consequently, the need for a war decision by that month's start.

【译文】永野修身强调，日本绝不应卷入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但他也援引“大阪冬之阵”的典故说，日本不能以最终的毁灭为代价追求转瞬即逝的和平。杉山对此表示赞同。他进一步说明，如需在十月底前具备开战能力，就必须在月初之前作出相应的作战决策。

*注释 1：大阪冬之阵，日本战国末期大阪之役的一部分。1614 年冬季，德川家康率军围攻丰臣秀赖的大阪城，久攻不下，遂与丰臣议和，丰臣同意以填平外护城河作为和平条件，以免立刻全军覆没，但德川利用这一机会使大阪城失去屏障，于次年的夏之阵轻易攻克大阪城，丰臣氏灭亡。

【分析】本例中，日本“总体战”派军官使用了“大阪冬之阵”的历史典故以论证开战的必要性，一方面称“日本绝不应卷入可以避免的战争”，另一方面又说“以最终毁灭为代价的和平”不应该是日本的目标，这容易被理解为“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开战”的自我正当化叙事；同时 *swore*, *warn* 等词倘若直译为“发誓”和“警告”，仿佛将这些军官塑造为了“竭诚为国”的正面形象，会与目标语读者的一贯理解产生冲突，因此在译文中需要调整这些词汇的表达效果。译文一方面把 *swore* 和 *warn* 分别译为“强调”和“说”，大幅削弱了原文的情态效果，降低了其正当性语气；另一方面加上“援引……典故说”，把“大阪冬之阵”明确标记为永野修身用于劝说和煽动的修辞资源，而不是译者认可的历史类比，拉开了译者与当事人话语的距离，变相削弱了“借古喻今”的效果，防止目标语读者产生误解。由此可见，作为重写的翻译可以通过调整话语位置和语气，操控读者对人物与事件的“形象”，以适应特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预设 (Lefevere 2016; Munday 2014)。

4.2 句法层面的重写

相对于词汇层面的重写侧重于针对特定词汇进行直观操控，句法层面的重写更侧重于在不予显性评判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句子内部的语义角色与信息组织方式来重构事件的呈现方式：同一事实在不同句法实现下，会在“谁是行动者、谁承受后果、何者构成原因、何者是背景”这些关键问题上产生显著差异，从而影响读者对责任归属与因果链条的直觉判断。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译者可借助对参与者配置、过程呈现与句式组织的调整，改变施事与受事的可见度、事件的动态性与可追责性，并在篇章推进中强化或弱化某些

逻辑关联，使译文更贴合目的语语境的叙事期待与可接受性规范。基于这一视角，句法层面的重写可以拆分为三种类型：参与者显化，即使动作的实际执行者或被影响者在句法层面充当重心；过程类型转化，讨论关系、心理、物质等过程建模的变更及相关语法实现如何重塑事件性质与立场效果；句式重组，分析长句拆分整合、主述位调整与显化逻辑关系等句法组织手段如何适应目标语的诗学规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叙事与解释框架。

4.2.1 参与者显化

为使“参与者显化”这一类句法重写的讨论具备可操作的衡量尺度，本节首先引入“责任阶梯（cline of responsibility）”模型，用以刻画不同语态与主位安排对责任归因强度的系统性影响。Li（2020）在翻译研究中沿用并发展该模型，指出能动性呈现往往与语态和主位选择相互牵连：语态转换既可能出于篇章主位推进的需要，也可能服务于立场与意识形态诉求，从而改变行动者承担责任的权重。在这一框架下，主动式与带施事的被动式都能显化施动者，但主动式因将施事置于句首主位而承担更高责任；无施事被动式只能让读者在语义层面推断施事；中动式（非人称结构）则把事件呈现为似乎“自发发生”，几乎抹除了外力与责任。据此，“参与者显化”可以在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条件下界定为：译者通过显化或前置施事、调整受事位置等手段，推动叙述在责任阶梯上发生上移或下移，从而在目标语语境中重分配叙述重心与可追责性。

以下两例中，前者将中动式重写为主动式以凸显责任主体，后者则通过语态转换将无施事被动式转换为主动式。

例 6

【原文】At this point, as historians—notably Robert Butow—have observed, Nomura committed a huge error. No word of Hull’s principles reached Tokyo... The effect in Tokyo was nearly the opposite of what Hull intended. The Japanese conclu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reatly wanted to avoid any clash in the Pacific and was disposed to yield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as a result.

【译文】就在此时，正如包括罗伯特·布托（Robert Butow）在内的多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野村（吉三郎）大使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把赫尔提出的四项原则传回东京……（结果）日本方面对局势的判断几乎与赫尔的本意南辕北辙：东京高层据此认定，美国极力避免在太平洋同日本发生冲突，因此有意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对日本作出让步。

【分析】这个译例的关键操控点，是把原文中“信息未能抵达东京”的低责任归因（中动式）重写为“野村没有把信息传回东京”（主动式）的高责任归因，从而在“责任阶梯”上明显上移，并通过主位前置进一步强化了责任归属效果。

对照原文第二句 No word of Hull’s principles reached Tokyo... 其表层主语是 No word，过程是 reached，东京只是目的地；原文的叙述把事件以结果状态呈现，强调的是“信息未送达”这一结果，施事者被结构性隐去，读者只能结合上一句的信息，在语义层面推断出信息没有传递到位的原因是野村大使的过

错，这种语义上的迂回变相削弱了责任归属效果。译文重写为“他没有把……传回东京”，一方面增补了明确参与者“他”（野村大使），另一方面以“他”作为主位，形成明确的责任链条：野村大使没有及时把“四项原则”传回东京，导致东京产生战略误判。在责任阶梯上，这相当于从“中动式”的低责任等级上移到“主动式”的高责任等级，从而将原文所强调的“沟通失灵”重写为“个人失职”。

后续的 *The effect in Tokyo...* 一句，原文以抽象名词“effect”作为主位，同样突出了事件的结果状态；译文改成“日本方面对局势的判断……”，显化出“日本方面”（即日本政府）这一决策参与者，并以“认定”作为动词，以心理过程重写 effect，把“误判”从抽象结果转为特定主体的认知行为，相当于把责任再一次从“状态”推向“行为者”。*The Japanese concluded that...* 亦采取了相同的操控策略：原文主语较泛（*The Japanese*），译文将范围缩小为“东京高层”，进一步把叙事中的认知责任归于决策层，而非所有日本人。这两处处理与前一句对“野村”的显化形成互补：前者显化“传递失败”的责任人，后者显化“认知错误”的责任人，因果链被重写为“传递失败后的战略误判”，而不是原文那种“信息传递的偶然失误”。

例 7

【原文】*The Asian colonies of the defeated European powers wer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coprosperity sphere. The United States was to be cowed through the Tripartite Pact. A truly self-sufficient Japanese Empire, immune from outside pressures, at last seemed in sight.*

【译文】日本已经将欧洲战败国的亚洲殖民地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并通过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制衡美国。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真正实现自给自足的“大日本帝国”似乎近在眼前了。

【分析】这一译例的核心操控点，在于把原文两处 *were to be done* 的被动结构重写为以“日本”为显性主语的主动句，从而把原本被“背景化”的责任归属前置并强化。原文对被动语态的使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施事者的身份，读者只能从语境和上下文推断这一系列动作的真正实施者，责任呈现相对松散；译文则先完成施事者的补充，把隐含的动作实施者明确统一为“日本”，再将两个分句并列整合，使“日本”在句首持续占据主位并支配两个核心动词“纳入”和“制衡”，形成连续的行动链条，引导读者将两者理解为日本的一系列战略动作，而非只是对抽象结果的陈述。根据前述的“责任阶梯”模型，主动句在显性呈现施事并将其置于句首时，会比被动句（尤其是省略施事者的被动句）更强地指派责任并赋予更高的文本显著性，因此这一语态转换等于把“日本”的责任等级上调，促使叙事焦点从“局势发生了变化”转向“日本主动筹划并推进了这些事件”。这种由微观句法调整累积而成的叙述焦点重写，正是翻译通过句法层面的重写产生更深远的语义后果的典型路径。

4.2.2 过程类型转化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视角看，过程类型的选择决定了经验世界被呈现的形式，而通过被动式、名词化或去名词化等手段可以改变原句的过程类型，从而服务于译者的特定目的。就重写理论而言，这种“过程类型转化”正是 Lefevere 所概括的译者常用策略之一，其效果在于为无法对照原文的读者“投射”一幅更具可读因果链与责任指向的叙事图景，而这种图景会显著影响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方式（Lefevere, 1992: 83）。

例 8

【原文】The “Outline of Policy toward the South” of 17 April declared that the objective southward was to establish imperial self-sufficiency and rapidly replenish the country's economic power by establishing clos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and Indochina and economic ties with the East Indies by diplomatic, not military, methods.

【译文】1941 年 4 月 17 日的《对南方施策要纲》指出，日本意图以“南进”与泰国、中南半岛建立紧密的经济、政治与军事联系，并以外交方式而非军事手段与荷属东印度建立经济纽带，从而实现帝国的自给自足并迅速恢复国力。

【分析】本译例集中体现了译者如何通过及物性系统中的过程类型转化，将原文静态的政策陈述重写为动态的战略图谋，从而在深层叙事上显化历史责任。原文核心句法结构 the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属于典型的“识别类关系过程”，其中“目标”作为主语，“建立（自给自足的体制）”作为表语，这种将动作抽象名词化的语言处理，使得日本的扩张行为被封装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政策，在语法层面上隐去了动作的发出者，符合西方实证史学客观化的叙事特征。然而，若在汉译中保留这种“目标是……”的静态系表结构，极易在目标语语境中掩盖侵略者的主观恶意，使读者误将其视为一种中性的国家发展规划。因此，译文打破了原文的静态框架，将其重组为“心理过程”与“物质过程”的复合结构，即“日本意图（心理）……建立（物质）……从而实现（物质）……”。这一重写首先通过增补“日本”为显性主语，将原本隐藏在抽象名词背后的施事者拉回前台，明确扩张行为的发出者；其次，引入“意图”一词，将原文中单纯的“存在（was）”转化为带有强烈目的性的“欲望”，并紧随“建立”“实现”等动词，将这种欲望落实为步步为营的物质过程。这种及物性模式的过程范畴转换，不仅激活了文本的动态图式，更在宏观叙事层面植入了一种批判性视角：它将一份看似中性的行政文件，重写为一场主观驱动的扩张阴谋，暗示了其“意图”建立霸权的野心，从而在不改变基本史实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符合目标语反侵略历史语境的立场平衡。

例 9

【原文】Now the time had come for real preparations to attack southward. These would be observable preparations, undoubtedly hindering negotiations, and so the time for the war decision had arrived. The cabinet had to wager all upon

diplomacy or resolutely determine upon war.

【译文】东条强调……现在必须为“南进”的入侵行动做好实战准备。这些备战举措势必会被察觉，并无疑会阻碍谈判，因此是时候交由内阁来决断了：是把一切押注在外交斡旋上，还是坚决开战？

【分析】此译例的句法重写要点，在于把原文以“时间到来”为中心的非人格化叙述，重写为“东条强调”的言说与决策表述，在及物性模式的过程类型上从物质过程转化为言语过程，强调了日本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符合目标语语境下对侵略战争责任归属的叙事期待。原文两次使用 *the time had done* 这一以“时间”为表面施事的过程组织方式，弱化了具体决策者；译文增补了“东条强调”（从上文可知），把过程类型由“时间到来”的客观物质过程，转为一个具体的言说过程，并用“必须”显性标注日本高层的情态，使“备战”呈现为由具体人物推动的政策行动，而不是某种客观实际所致。类似地，原文 *observable preparations* 偏向于对 *preparations* 进行静态的属性界定，译文处理为“势必会被察觉”，将属性关系重写为感知过程的被动式表达，并与“无疑会阻碍谈判”构成更强的因果链，服务于后句“交由内阁决断”的决策框架，进一步把“开战与否”定位为主体可选择、可追责的行动，将其定位为受主体认知影响的可控行动，并非真正的“天意到来”。与此同时，依过程类型灵活变换的动词赋予了句式显著的动态特征，营造出强烈的行动张力，整个重写过程正契合 Lefevere 所说，翻译作为重写会通过具体语言策略去“投射”译者所理解的原作形象，并在目标文化中产生更强的解释力与接受效果

（Lefevere, 2017, 7）。因此，本译例通过重组及物性过程类型，完成了句法层面的重写，将战争准备叙述为可归因、可问责的政治决策过程，而非不可避免的时势转折。

4.2.3 句式重组

Lefevere (1992) 将“诗学”界定为双重构成：一方面是体裁、母题、典型人物与情境等修辞或叙事的手段，另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系统中应当如何发挥功能的观念，而后者会直接影响哪些主题与呈现方式在目标语系统中可以被接受；同时他也指出，诗学的“功能”维度往往与外部意识形态力量紧密相连。在此框架下，“句法层面的操控”可以理解为译者顺应目标语“翻译诗学”对可读性、论证性与叙事推进方式的规范约束：特定时期或语境下的翻译诗学会迫使译者优先选择某些言语行为策略，并且这些策略并不限于词汇对等，而会跨越诗学、意识形态、话语世界与语言组织层面共同运作。

例 10

【原文】The asset freeze, soon a complete embargo, decided the leaders of the Imperial Army that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was not feasible in 1941 and that the navy's version of the Southward Advance—which included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had to be endorsed... As, most recently, Akira Iriye has written, Japan's fate was not in Japanese hands. Besides its obviou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America, Japan was buffeted by the course of the war in Europe.

【译文】资产冻结很快升级为全面禁运，这一系列制裁迫使日本陆军认

定，1941 年已不具备对苏开战的条件，只能转而接受海军的“南进”方案，其中包括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正如入江昭（Akira Iriye）等学者所指出的，日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和欧洲战局的发展所牵引，日本事实上被推着走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

【分析】译文通过句式重组，将原文相对平铺直叙的并列结构，重写为更符合汉语论述习惯的“环环相扣”式逻辑链条。首先，译文重构了第一句的长难句结构（The asset freeze...decided the leaders...），将其转写为包含“背景——认知——行为”的连续因果分句。译文借助“升级为”、“迫使”、“只能”等谓语动词及关联成分，显化了事件发生的路径，并通过拆解为分句降低阅读难度。其次，针对第二句中关于“日本命运”的抽象表述（Japan's fate was not in Japanese hands），译文将其具象化为“日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所牵引”。通过“被”字句将原文的状语（Besides...on America）整合为新句子的施事，从而在句法上实现了施事（欧美）的引入与受事（日本）的前台化。最后，结尾处“日本事实上被推着走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为原文无对应表述的增补内容，属于典型的解释性显化策略：译者基于对日本历史的认知，将“被牵引”的隐含结果予以明确点出，在句法上构成结果状语。这一增补并非任意发挥，而是将原文隐含的历史因果链条完整呈现于译文中，使叙事逻辑更为闭合。

从重写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句法重组服务于一种更具“结构性”的战争叙事：既不减弱日本军部在对外侵略中的主动性，又通过突显大国制裁与全球战局的影响，向读者展示结构性压力如何与日本内部军国主义“合谋”，最终将战争推向失控。这种处理既回应了国内史学关于“日本侵略的主观能动性”与“国际环境的客观制约”辩证关系的探讨，也在诗学层面保留了原书试图揭示的历史复杂性。

例 11

【原文】Then came the American freeze.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the freeze was what Washington had hoped to avoid: a firm decision in Tokyo to proceed with the Southward Advance. The critical element in this decision was the army, where even the most vigorous advocates of an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now agreed that the south demanded first attention.

【译文】紧接着，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华盛顿试图避免的局面反而因此出现：东京借机在内部下定决心，全力推进“南进”。这一决策的关键推手是陆军：即便是此前最坚定的对苏作战派，此时也不得不承认，必须先把主要兵力投向对英美殖民地的“南方”作战。

【分析】英语作为典型的形合语言，倾向于利用名物化结构将复杂逻辑封装在静态名词短语中，赋予文本客观的实体感；而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则更习惯通过小句的线性铺陈来显化事理逻辑。在本例中，原文呈现出典型的信息静态化特征，主要通过抽象名词陈述历史结果。对此，译文并未机械保留这种名物化结构，而是采取了“去名词化”与“逻辑显化”的双重重写策略。

首先，译文实施了从“静态名词”到“动态过程”的句法还原，将原文承载核心意义的名词 *consequence* 和 *decision* 还原为动态的小句结构，并增补了“反而因此”和“借机”等隐性逻辑连接词。这一操作将原文隐含的因果链条显性化，把原本松散的现象罗列重组为“外部施压——内部反应——最终行动”的紧凑结构，不仅恢复了历史事件的动态过程，更清晰地展示了日本军部如何利用外部压力作为内部动员的杠杆，从而强化了叙事的逻辑张力。其次，译文对句法层级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原句中 *where*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被重组为独立的并列分句，不再仅作背景修饰；同时，译文对情态系统进行了大幅调整，将原文中较为中性的心理过程动词 *agreed*，显著上调为带有强制性义务情态的“不得不承认”与“必须”。这种处理在逻辑语义上构建了一种“形势逼人”的必然性叙事，暗示各派系达成一致并非基于主观契合，而是在客观局势压迫下的无奈妥协。

从重写理论来看，这种从静态陈述到动态论辩的句式重组，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一种深层的历史叙事重构。它构建了一种逻辑上的“缴械”效果，迎合了目标语史学语境中对于“历史必然性”解释框架的期待，成功地将这一静态的历史节点，重构为日本军国主义在外部结构性压力与内部扩张野心共同作用下，不可逆转地走向战争升级的关键决策瞬间。

例 12

【原文】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if Japanese funds were frozen on an announced basis of preventing the flight of funds but of permitting Japan to continue to have normal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ndency of control machinery would be to tighten so that,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the character of the control would be completely changed, the yardstick of normal trade forgotten and very drastic pressure applied against Japan's purchases in this country.

【译文】以往经验表明，一旦美国打着“防止资金外逃”的旗号宣布冻结日资，却仍允许美日之间的正常贸易，美国的外汇与贸易管制机关就会不断收紧控制，不多久就会发生性质上的根本变化，“正常贸易”的尺度被抛诸脑后，对日本在美采购施加的约束也会迅速升级。

【分析】原文呈现典型的英语形合特征，句法结构严密且嵌套层级复杂：*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引导宾语从句，其中包含冗长的 *if* 条件状语从句，内部嵌套了多重介词短语修饰；主句部分则通过 *so that* 引导结果状语从句，并列使用了三个被动结构（*changed, forgotten, applied*）来描述后果。若在翻译时机械保留原句的嵌套结构，不仅不符合汉语意合的行文习惯，也会导致信息密度过大，增加读者的认知负荷，难以构建清晰的“条件——过程——结果”逻辑链条。

因此，译文采取了句式拆分与线性化重组的策略，将原句的从属复合结构转化为三个逻辑递进的独立分句。首先，译文保留“以往经验表明”作为宏观评价框架，将 *if* 从句及其内部修饰语整合为第一层条件分句；其次，将原句 *so that* 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结果成分提取出来，成为“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与

“尺度被抛诸脑后”两个并列的谓语结构，添加“不多久”作为隐含的因果关系提示语，实现了信息的线性铺陈，易于读者理解；最后，译文将这三个被动分句处理为语义层递的流水句：先叙述“管制性质”与“评判尺度”等抽象层面的变化，再落脚于“约束升级”这一具体行动，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线性铺陈，正是译者利用句末重心原则强化信息焦点，制造递进关系的有效手段。这一系列句法操作利用了目标语短句化的诗学规范，对源文本进行了结构性重写。通过切分句界、重置信息焦点，译文将原文中隐含在长句末尾的后果信息进行了“前景化”（foregrounding）处理。这不仅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更在叙事层面强化了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并最终走向失控的逻辑必然性，从而让读者更清晰地感知到美方政策转变对日本构成的结构性压力。

4.3 叙事层面的重写

Baker（2019）认为，叙事不仅“复制现有的权力框架”，也同时“提供了抵抗其的方式”，而译者“具备独特的方式进行叙事干预”。在涉及敏感历史题材的翻译实践中，这种干预不再局限于微观的字句转换，而是上升为一种对历史记忆与阐释框架的宏观调适。面对源文本看似“客观中立”的学术叙事与目标语语境下主流历史认知之间的张力，译者必须在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的引导下，对原著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叙事”。这要求译者跳出单句的束缚，审视事件之间的因果连接、时间框架以及责任链条，通过对情节的重新配置

（emplotment）与视角的重构（reframing），在译文中构建出符合目标语伦理期待的历史图景。基于此，本节将聚焦于叙事层面的宏观操控，分别从“重写战争合理性”与“重写责任归属”两个维度，探讨译者如何通过叙事策略的调整，在保持史实准确性的同时，有效规避为侵略者逻辑背书的风险，实现负责任的历史跨文化书写。

4.3.1 重写战争合理性

本节聚焦于译者如何通过叙事干预，解构源文本中隐含的战争“必然性”与“合理性”逻辑。在源文本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往往被封装在“经济安全”、“生存必要性”等看似客观中立或防御性的术语之下，构建出一种“形势所迫、不得不战”的虚假逻辑闭环。为规避这一叙事陷阱，译者在标题拟定、因果链条重组及情态逻辑表达等层面进行了针对性的重写。通过剥离其“客观必然”的伪装，将其还原为非理性的政治赌博与人为的主观决策，从而在目标语中重塑战争性质，从根本上消解侵略行为的正当性基础。

例 13

【原文】*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译文】《孤注一掷：饮鸩止渴的经济安全》

【分析】Lefevere 指出，译者作为重写者，可以通过多种策略来投射其所理解的原作形象，并在目标文化中塑造作品的接受路径（Lefevere 2017: 83）。在叙事层面，书名属于典型的副文本要素（paratext），其功能在于读者阅读正文之前，传递作者或作为重写者的译者给定的立场。它是引导读者进入文本的

重要方式，也是读者首先接触并据以预设立场与主题的阈限（Genette 1997: 1-2）。具体到本书，将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译为《孤注一掷：饮鸩止渴的经济安全》，实质是在标题层面对全书宏观叙事进行 Baker 所谓的“再框定”（re-framing）。原题名的直译《日本为总体战做准备：寻求经济安全》旨在呈现研究命题，语义上倾向于客观描述；而译名综合了全书内容与历史结果，将重点置于“准备总体战”这一行为本身的盲目性与疯狂性。译文通过“孤注一掷”强调其“不得已”的赌徒心态，通过“饮鸩止渴”批判其不顾长远后果的非理性，从而将其定性为典型的军国主义产物。这种译法相当于预先为读者提供了特定的解释框架，以强烈的评价取向削弱了“经济安全”一词可能带来的正当化联想，引导读者将后续历史进程理解为被结构性困境与非理性决策共同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值得同情的自保行为。这种对标题进行叙事重构的组合操作——即将过程性命题重写为对决策的定性，并予以“饮鸩止渴”的补充评价——利用副文本的先行框架调节了全书的进入角度与接受预期，充分体现了重写在目标文化语境中通过预先引导实现叙事操控的路径。

例 14

【原文】The army was in worse shape... One year later, as these stocks dried up with no end to the China fighting in sight, it was clear that the halting of imports of foreign oil would fatally cripple Japan.

【译文】陆军的境况更加糟糕……一年后，对华战事的遥遥无期使日本石油储备逐渐枯竭，显而易见的是，停止进口外国石油将使日本陷入致命困境。

【分析】本例是 Baker 的叙事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原文中，with no end to the China fighting in sight 只是从句中的一个介词短语；从句法层级上看，它属于伴随性的背景信息，并非强调的重心（原文重心在于“石油枯竭”）。然而，译文采取了前景化的策略，将这一成分前置为主语，译为“对华战事的遥遥无期”，同时被显化为“日本石油储备逐渐枯竭”的原因。其直接理由在于：第一，结合上下文语境与历史现实可知，对华战事确为日本石油枯竭的重要原因；第二，“遥遥无期”的四字格处理符合中文的诗学规范；再次，这种安排把叙述重心放在“侵华战争长期化”这一前因上，由此再推出“石油停供将致命”的后果判断，从而将信息重排为“战争持续——消耗资源——停供致命”的因果链条。这种重排旨在将日本石油危机从“客观现实导致”重写为“咎由自取”，从而削弱“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根据 Baker 的叙事理论，这种做法被称为“因果情节配置（causal emplotment）”，其功能就在于“给孤立事件赋予意义”，使读者能够“权衡并解释事件，而不是简单罗列”（Baker, 2006: 61, 67）。具体到本例中，“对华战事遥遥无期”前置并转换成显性的因果起点，正是在改动事件的“权重分配”，让读者把资源枯竭首先理解为侵略战争长期化的代价，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续的禁运如何“逼迫”日本。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时间框架的重置：通过时间与空间的重新框定，就足以“凸显或压低”某种叙事视角（Baker, 2006: 113）；在本例中，译文用前置的手段把“战争久拖不下”从背景时间介绍提升为叙事推进的第一推动

因素，进而在读者层面完成责任归属的隐性重写。

例 15

【原文】Sugiyama concurred. He explained the necessity of readiness to begin hostilities by the end of October and, consequently, the need for a war decision by that month's start.

【译文】杉山对此表示赞同。他进一步说明，如需在十月底前具备开战能力，就必须在月初之前作出相应的作战决策。

【分析】在本例中，原文大量使用静态的抽象名词，如 *necessity*、*need* 等。正如前面在“句法层面的重写”一节所述，在政治与军事话语中，这种名物化（*nominalization*）表达往往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它将“想要开战”这一主观意图，封装为某种客观存在且不可违逆的“客观事实”。杉山试图通过这种修辞，构建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逻辑闭环：因为存在某种“必要性”，所以必须开战。若译者采取直译策略，将其译为“他解释了……的必要性”，则无异于在中文语境中复制了侵略者的内部逻辑，默认“南进”是出于形势所迫的必然结果，从而落入为军国主义辩护的叙事陷阱。为规避这一风险，译文对原文句法进行了去名物化的重写，将名词性结构拆解为条件判断句“如需……就必须……”。这一重写有两个效果：首先，它剥离了原文披在战争决策上的合理性外衣，通过引入条件连词“如需”，译文将原本看似绝对的“必要性”降格为一种基于特定前提的“工具理性”，这一处理清晰地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语主流历史观的遵循：所谓的“必要”不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必然，也不是出于道义的必须，而仅仅是一种基于特定假设下的技术性推论。换言之，这种“必要”是人为制造的。其次，这种处理有效地削弱了日军“南进”与开战的合理性。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抽象名词的 *necessity* 往往无形中掩盖了施事者，仿佛是局势在要求日本开战。而译文通过“如需……就必须……”的逻辑重构，强调了这种逻辑的主观性和条件性：是日本军部自己设定了时间表，才导致了后续的所谓“紧迫感”。这种处理方式将焦点从被建构的局势，拉回到了人为的主观决策上。

4.3.2 重写责任归属

历史责任的归属是战争叙事中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维度。在源文本中，部分表述往往通过“客观化”修辞掩盖了侵略者的施动者身份，甚至倾向于将冲突升级的诱因归咎于受害者的“应对失当”或双方的“理念分歧”。为纠正这种潜在的叙事偏移，本节考察译者如何通过视点转换与框架重置来重新厘清责任主体。无论是将看似客观事实的“中方失职”还原为日军的主观误判，还是将“愿景冲突”的表象刺破为“霸权争夺”的实质，译者都致力于在叙事层面重构因果链条，拒绝复制源文中隐含的为侵略开脱的逻辑，从而确立符合历史正义与目标语伦理预期的责任认知。

例 16

【原文】 These events staggered Ishiwara. Apparently Sugiyama had been right about the unreliability of Sung and his army.

【译文】 这些事件震惊了石原莞尔，他相信了杉山的观点，即不能信任宋哲元和他的部队。

【分析】 关于战争与暴力记忆的翻译研究表明，译者在处理涉及创伤的历史叙述时，往往通过删减、重写或语气调整，来在历史真实性、意识形态立场与目标读者可接受性之间寻求平衡，翻译因此成为一种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实践（Hou 2023: 213–235; Qin et al. 2025: 69–70）。

具体到本译例中，核心操控之处在于对第二句话的处理。Apparently Sugiyama had been right...在原文中体现的是石原莞尔的态度：它不仅复述了杉山的观点，还认可了“宋哲元的部队不可靠”这一判断。这与国内对卢沟桥事变的认知南辕北辙，直译显然难以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因此，译文将这一判断内化为石原的个人心理活动：“他相信”显化了这句话的叙述者，防止读者认为这是作者的观点，从而影响这本书在目标语历史语境下的接受度；类似地，把 unreliability of Sung and his army 处理为“不能信任宋哲元和他的部队”，语义重心从“不可靠”转为“在石原眼中不值得信任”，将对宋哲元的评价重新框定为侵华军官的主观感受，而非对中国军队的第三方评价。这种叙事重构既回应了中国语境中对抗战记忆的政治与伦理要求，也避免在译文层面体现“国军失职导致卢沟桥事变”的单方面错误历史叙事。因此，这里的重写不仅是词汇的替换，更是通过将无明确发出者的、看似中立的评价转写为人物内心独白，在不支持日方观点的前提下保留了事件推进所需的、来自日军的心理认识过程。正是这种叙事层面的重写，使译文既忠实呈现了日军军官的认知逻辑，又与当下中国关于卢沟桥事变责任归属的主流叙事和意识形态格局保持基本一致。

例 17

【原文】 The Chinese did not respond appropriately. General Ch'in Te-ch'un... agreed to withdraw his troops from the bridge. But Chiang exhorted Sung to hold his ground, declaring that he himself would send six divisions.

【译文】 中方的反应超出了日本的估计……秦德纯将军……同意将其部队撤离桥梁一线，但蒋介石随即要求宋哲元坚守阵地，并表示他将以本人名义调派六个师前往增援。

【分析】 本例是在翻译中重写历史事件责任归属的又一典型案例。The Chinese did not respond appropriately 原意为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中选择了还击，即没有做出（日方认为的）“恰当反应”。这种表述似乎将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军队，显然是目标语历史文化语境所无法接受的。因此，译文未直译为“中方没有作出适当回应”，而是重写为“中方的反应超出了日本的估计”，其核心在于重构“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归属。

原句主语为 The Chinese，谓语为 did not respond appropriately，语义上给中方贴上了“反应过激”的标签，默认以日方立场为评判标准；其虽未说明何为

“恰当”，却已先行将责任压在中国一方。译文保留了“中方的反应”作为话题，但将评价性谓语重写为“超出了日本的估计”，将“问题”从“中方回应不当”转化为“日方预期与实际之间存在差异”，即问题在于日方的认知偏差，而非中国军队保家卫国的责任。这一操作，一是将原文隐含的、对中方施加错误要求的“应然”（中方应当反应恰当）转化为客观的“实然”（日方判断失误是无争议的事实）；二是显化隐含的认知主体，引入“日本的估计”，将原本无标注的评判视角归入日方一侧，使读者明确这是一种立场性判断，而非叙述者的中立评语。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重写，也是叙事责任链的重构：后文关于国民党内部的复杂分歧，不再被首句预设为“中国反应不当”的后果，而是呈现为日方用单一预期框架误读了一个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的对手。

Baker 认为，翻译是一种“重框定”（re-framing）；通过调整标签和视角，源语文本中的“责任叙事”被重新构建，读者从而可以看到另一种叙事版本，而非复制原文对行为合理性的裁断（Baker 2006: 105-106; 2007: 152-153）。从重写理论来看，这种责任重写也回应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约束：在当代中文抗战叙事框架下，译者倾向于通过微观措辞调整，将“错误”指向侵略方的认知与决策，而非接受原文对中方的负面评价。

例 18

【原文】The Pacific War was, in essence, a conflict between two visions for East Asia. Each vision had a strong economic element. Japan's fundamental war aim was to establish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as a self-sufficient and powerful unit with the Japanese Empire at its core. The United States sought, first, to thwart Japan's attempt and, second, to “restore”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Open Door.

【译文】从本质上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围绕东亚秩序主导权的较量，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东亚愿景，各自都带有鲜明的经济诉求。日本的根本战争目标，是以大日本帝国为核心，建立一个自给自足、具有强大力量的“大东亚共荣圈”；而美国首先要挫败日本的这一企图，其次是在东亚恢复其“国际合作”原则与“门户开放”政策。

【分析】Baker（2006）认为，叙事不是对孤立事实的照相式复写，事件及其意义需要在整体叙事中被“构成”，而围绕叙事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对事件的选择、凸显与权重分配之中。原文 a conflict between two visions for East Asia 若直译为“两套东亚愿景之争”，容易被理解为日美双方基于各自对东亚治理理念的分歧，从而冲淡了其中的权力结构与霸权争夺含义：无论是直接运用暴力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还是看似温和的“门户开放”，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对东亚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译文通过增补解释性说明“围绕东亚秩序主导权的较量”，把抽象的 visions 具体化为“秩序主导权”，将冲突的核心从“理念之争”重写为“秩序霸权之争”。这本质上是在重设叙事框架与价值指向，使“愿景”被读作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的秩序工程，而非中性的观念分歧（Baker 2006: 61, 73）。

在当代中文史学叙事中，太平洋战争通常被理解为是围绕区域国际秩序的冲突，其核心是日本试图以“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共荣圈”重塑区域秩序，与当时既有的、以条约体系与开放秩序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及其主导力量发生结构性对撞。译文使用“秩序主导权”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话语，实际上是将原书的 *visions* 重新嵌入目标语历史文化语境熟悉的“反帝反霸权”叙事体系中，同时点明秩序之争的本质。因此从叙事层面看，这一重写有两点效果。其一，它重新设定了整段话的“问题”：原文侧重于将太平洋战争表述为两种被经济因素驱动的理念与愿景的交锋；译文则先抛出“谁将主导东亚秩序”的权力之问，再说明其愿景之争与经济驱动的性质。由此，经济因素从中立的背景话语变为霸权斗争的工具和借口，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二战前后东亚的讨论相呼应：东亚地区在当时被普遍视为一种以“霸权——从属”关系为结构特征的等级秩序，而不是主权平等的理念共同体（Kang 2020; Ikenberry 2004）。其二，这种重写削弱了原句那种“对等”的语感，在中文语境中更易被读作“美日两个大国围绕东亚主导权的博弈”，从而与国内长期以来将太平洋战争置于反法西斯战争和反殖民结构性斗争中的主流叙事保持一致。

5. 结语

本次翻译实践中，笔者以迈克尔·A·巴恩哈特 1987 年出版的学术专著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为对象文本，尝试在保持史学论证链条与信息密度的前提下，将其关于日本战时体制与“经济安全”逻辑的解释引入中文语境，并通过译者可见的策略选择回应意识形态敏感叙事所带来的接受风险。围绕“历史文本翻译中的重写”这一核心问题，笔者在理论层面以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为总体框架，结合贝克的叙事视角，并引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分析资源，将译者干预具体化为词汇、句法与叙事三个相互勾连的操作层面。译例分析表明，历史书写并非单纯的事实搬运，译者在命名、评价与责任分配等关键位置上的细微调整，会直接影响事件因果的呈现方式与读者对行动者的道德判断；因此，所谓“忠实”不仅意味着信息对应，更意味着对叙事效果与价值指向的自觉把控。

在翻译实施层面，笔者以“AI 初译——人工重写”的后编辑流程完成文本处理，并将大语言模型主要用于提取关键信息、生成初译版本和提示潜在难点，再以人工细读作为最终质量门槛。实践过程中最突出的难点集中在三类问题上：其一，源文本中大量政策术语、机构名与专名在跨语际转写中容易出现指称漂移，需要通过语境回溯与资料核验来确定更稳定的中文表达；其二，英语学术叙述常以技术化、抽象化词汇弱化行为性质与价值评判，若直接对应，可能在中文语境中造成不必要的立场模糊；其三，长句与复杂修饰结构在不拆解的情况下难以兼顾可读性与逻辑清晰度。对应地，笔者在词汇层面侧重通过重新命名与评价强度调节来校准立场预设，在句法层面通过主客体安排与过程类型调整来凸显责任走向与行动逻辑，在叙事层面则通过信息取舍与进入角度的组织，尽量避免译文对侵略行为产生弱化或正当化的联想，同时维持原著论证的完整性与学术可读性。

需要反思的是，笔者的译例选择仍具有一定局限，部分分析不可避免带有译者的解释立场；同时，历史文本涉及的跨语专名与制度性概念极为复杂，单次实践难以穷尽所有不确定性。未来，笔者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史料与术语谱系的系统梳理，完善长文本一致性管理的工作规范，并在更大范围的语料与更严格的质量评估框架下复核本研究提出的操作路径与分析维度。总体而言，笔者希望通过本次翻译与分析，为意识形态敏感型历史文本的负责任译介提供一份可复用的经验参照，也为重写理论与叙事视角在非文学历史文本翻译中的落地提供更扎实的文本证据。

参考文献

附录